

第一章

光明与黑暗的搏击

一 和为贵的政治智慧

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取得重要成果后，在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发表的简短讲演，道出了历经战祸的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

1945年8月15日。无线电波掠过日本海，飞越太平洋，把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向全世界。霎时间，备受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华大地震动了，同仇敌忾抗战八年的中国人民沸腾了。从民主革命圣地延安，到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从全国各解放区，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到处是游龙舞狮，爆竹喧天，一派欢庆胜利的热烈景象。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重振民族复兴精神的历史时刻，非笔墨能形容于万一。在举国狂欢，普天同庆的日子里，人们迫切盼望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然而，当时浮现中国上空的“内战的阴霾”，又令各方人士怀着深深的忧虑。

自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

向日本战略后备队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远东的时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令。各解放区军民迅即向敌占区城镇和交通要道挺进，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日伪军大举反攻，率先光复了大片国土和许多中小城市。而整个抗战时期躲在大后方消极避战、保存实力的蒋介石，却命令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同时，严饬远在中国西南部的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长期包围抗击他们的人民军队缴械投降。用毛泽东形象的比喻来说，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深刻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提出了在历史转变关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方针。他指出：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0、1126页。

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有许多困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空前壮大，已拥有 1 亿人口、100 多万军队和 200 多万民兵；二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内战，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纷纷紧急呼吁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三是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在国际上，美、英、苏三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调整相互关系，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当时，美国出于独占中国的目的，采取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为帮助国民党军队赢得尽快控制中国局势的时间，要蒋介石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遏制共产党；苏联为同美、英等国在某些国际问题上达成协议，也建议共产党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以避免发生内战，导致“民族毁灭”。这种形势从根本上说，对中国人民和平建国是有利的。

迫于上述形势，特别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还远在西南地区，一时难以调运足够的兵力到沿海及东北各地，蒋介石不得不摆出一副要“和平谈判”的姿态，于 8 月 14 日、20 日和 23 日连续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此举图谋有二：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宣传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把他企图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又可利用“和谈”来麻痹共产党，以取得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8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问题。会议认为，和平、民主、团结是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利益所在。我党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

的。我们要学会在和平条件下进行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先去重庆谈判。 25 日晚，中央几位领导人听取了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的汇报，再次权衡利弊，决心同意毛泽东立即去重庆，以击破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并认为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人心、蒋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2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说明了党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作出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对于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通知提出了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在我党作出必要让步后，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我们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27 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载来了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将军。毛泽东在内战燃眉之际亲赴重庆奔走和平，实为国家民族大计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举动，党内外普遍感到担忧。为此，毛泽东在赴渝前，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谈了一整夜。他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农民群众活动越积极，我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8 月 28 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同机抵达重庆，受

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当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张治中陪同下，容光焕发地出现在机舱口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抢拍下这一历史镜头。毛泽东亲赴重庆的消息，立即成为轰动国内外的一件大事。当晚8时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一行举行欢迎宴会。抗日战争结束后关乎中国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就在这样变幻莫测的氛围下，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展开了。

毛泽东、周恩来等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即在林园先后同蒋介石和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初步商谈。由于国民党对谈判本无诚意，又没有料到毛泽东会这样快应邀来到重庆，因而连一个具体方案也提不出来。中共方面将拟定好的两党谈判方案十一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这十一项内容，考虑双方现有政治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作出了大批裁减军队和撤出南方解放区等重大让步。但是，国民党方面连把这十一项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不愿接受。蒋介石在毛泽东抵达重庆之时，只给了国民党谈判代表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责成国民党谈判代表根据他的“谈话要点”拟定方案，致使谈判中断三天。

9月8日双方继续谈判。在周恩来的一再追问下，张群才拿出一份《对于中共9月3日提案之答复》，共十一条，对中共提出的基本要求都加以拒绝。在随后进行的6次谈判中，双方的主要争执点集中在军队问题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为进一步表明诚意，在原拟方案的基础上再作让步。但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坚持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不能超过16个师，并须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指挥；而对共产党应在解放区拥有行

政权的正当要求,则称“何异乎割据地盘”。此外,在国民大会和政治会议问题上也发生争论,使谈判陷入僵局。

在持续三周的第一轮谈判中,共产党谋求国内和平的真诚愿望和耐心,赢得了各界人民的广泛同情,连中间力量也认为共产党一再作出重大让步,已做到了仁至义尽。而国民党则拒不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地位,一再采取高压手段予以取消或削弱,遭到进步舆论的谴责。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其顽固立场,自9月21日会谈后,中外瞩目的国共谈判完全停顿下来。这时,重庆谈判能否取得成果及取得怎样的成果,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极大关注的问题。重庆《新华日报》每天不断收到读者的来信,要求公布谈判的进展情况,重庆各阶层人士也经常询问谈判结果。一时间议论纷纷,甚至传出了国共谈判濒于破裂的消息。

为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澄清舆论和答复全国人民的要求,毛泽东在谈判间隙广泛会见各方面人士,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强调: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的结果,使中国能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目前共产党竭力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并自许多地区后撤,避免冲突的危险。周恩来则多次举行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向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和文化界、新闻界、产业界、妇女界等广泛解释中共的主张,说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真相。这就在社会各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

在各方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于9月27日起恢复谈判。在新的一轮谈判中,为了打破僵局,促使尽快达成协议,中共方面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继续主动作进一步退

让：在军队问题上，表示在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的条件下，愿将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 24 个师、以至 20 个师的数目。在解放区问题上，提出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进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政府加委等。并决定将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省区的解放区让出来。

这种顾全大局、相忍为上的精神和一系列让步措施，得到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由衷钦佩和赞许，粉碎了国民党舆论工具制造的“共产党只要地盘，争枪杆子”的诽谤。经过反复的斗争，蒋介石只得接受中共方面的建议，把已经取得一致或相近意见的问题加以公布，对尚未取得一致的问题分别说明双方各自的看法，留待两党代表继续商谈；并同意以中共方面起草的《会谈纪要》为基础进行讨论和修改。至此，重庆谈判在中共方面的艰苦努力下，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重庆开展的这场谈判斗争，始终是与双方在战场上的斗争交织进行的。早在 8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就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华北解放区大举推进。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一面与毛泽东会谈，一面密令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编写的所谓《剿匪手本》重新印发，在其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为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捞取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蒋介石下令山西阎锡山部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以主力占据同蒲路，一部侵入上党地区，企图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就范。为此，毛泽东发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予以还击的指示，着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组织上党战役，歼灭了进犯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主力 11 个师和一个挺进纵队共 3.5 万人，活捉军

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这一仗打痛了蒋介石，最终迫使其同意签署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共产党将政治谈判与军事斗争密切结合，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表现了针锋相对的高超斗争艺术。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在位于城郊嘉陵江畔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度过了 43 个日日夜夜，为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力量，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充分把握在渝的难得机会，会见了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袖、教授学者、知名人士、妇女团体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同他们就和平建国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时，他还和国民党的各派人物包括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接触。

在与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的多次会面中，毛泽东高度赞扬民盟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并详尽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这些谈话，使民盟的许多朋友认识到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全国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的，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促使民盟同中共方面保持密切合作及默契的态度。及至谈判将告一段落，张澜向毛泽东建议说：“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好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慨然采纳，当即考虑对策，后来形成周恩来起草的《会谈纪要》。张澜还在报刊上发表了《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对国民党所谓“民主必恃武力始能保障”、“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的谬说，予以有力的抨击。为此，毛泽东当面赞誉张澜是“老成谋国”。

在重庆，毛泽东几次会见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对她忠诚不

渝地信守孙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从而更坚定了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鲜明立场。毛泽东还会见了冯玉祥、谭平山等国民党进步人士，赞许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和进步活动，勉励他们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努力。在与重庆报界朋友的会见当中，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的说法，用诙谐的语气比喻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这既抨击了蒋介石不给人民自由、民主的独裁政策，又善意地帮助一些中间派朋友澄清了模糊认识。

毛泽东得知抗战时期汇集西南的工商业资本家，希望从他那里进一步了解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便在桂园举行茶会，会见了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亚园、吴梅羹、章乃器、范旭东等产业界代表。毛泽东向他们郑重指出：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新中国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政策。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并不是作为敌人，而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这一席话，打消了几位资本家代表的顾虑，他们当场表示要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嗣后，毛泽东还通过答路透社记者问的形式，向中外宣布：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将提议实行一个经

济文化建设纲领，其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带垄断性质的部门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国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等等。这使更多的国内人民和国外人士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方针的理解和支持。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特意登门访问了陈立夫、戴季陶、吴稚晖、白崇禧等国民党右派人物。对此，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在同陈立夫等人的晤谈中，毛泽东襟怀坦荡，回顾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情景，批评国民党后来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他谈到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提请国民党认清人心所向，不要重蹈覆辙。这些既严肃又透着大度的谈话，每使对方自愧理屈词穷，不得不表示要对此此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

毛泽东在渝期间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双方协议的达成。10月10日，《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终于在曾家岩桂园客厅内签字，并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史称“双十协定”。《会谈纪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确定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表明，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这是重庆谈判取得的最重要的收获。但是，尚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蒋

介石直到与毛泽东的最后商谈时，仍提出要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的方针，表示他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决不再作让步”。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决定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周恩来等将继续留在重庆，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商谈。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张治中将军举行的欢送宴会，并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指出：“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演讲不断赢得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鼓掌。“和为贵”——这句凝聚着中华政治智慧的古训，道出了历经战祸的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

毛泽东的重庆之行，恰如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赋诗所颂，堪称“弥天大勇”。一些中间派人士对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赞语，传遍了整个山城。连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戴季陶也不由发出感慨：“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随着毛泽东乘坐的飞机腾空远去，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们愈来愈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身上。正像毛泽东在重庆特园民盟总部的题词所昭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尽管前面还有许多困难，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一定会迎来无限光明的前途。

二 力争东北大工业基地

“向南防御，向北进攻”的方针，体现了毛泽东的

一个重要战略思想：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的情况，并客观地评价了“双十协定”的积极意义。他指出：“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会议经过讨论，同意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

第二天，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了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首先肯定“双十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的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接着指出应注意下列各点：第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各路进攻，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第二，解放区问题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能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可能出现。第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第四，我方答应退出南方八个省区，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解释及适当处置。第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提请全党不要对蒋介石公布“双十协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

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①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给他的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等颁发“剿匪”密令，继续污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奸匪”，令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很明显，就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全东北。为此，蒋介石积两个多月时间，从西南、西北地区紧急调运了几十万军队到冲突前线，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向华北解放区推进。接着，美国又动用大量军舰、飞机，帮助蒋介石将5个军陆续运到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还出动美军海军陆战队5万余人，在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强行登陆，为蒋介石据守战略要地，以接应沿铁路线向华北推进的国民党军队，并做好运兵东北的准备。这样空前规模的运兵，用当时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的话说，“相信此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空运和海运”。

在日益严峻的局势下，中共中央、毛泽东确定了进行绥远（平绥）战役、邯郸（平汉）战役和津浦路战役，给进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强调这是自卫战争，我方具有充分的理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1159页。

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中国人民有利。遵照中央的战略部署，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及华中各军区部队，集中一切力量，精心组织实施，胜利地进行了绥远、邯郸、津浦路三次战役，共歼灭进犯之敌近 11 万人，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争取东北的斗争，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北自 1931 年九一八沦陷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不战而退、沦丧国土的罪责，全无收复失地之寸功。而中国共产党却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同日寇浴血奋战，坚持了长达 14 年的艰苦卓绝斗争，在那里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并且在华北与东北的结合部建立了冀热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和交通发达，余粮较多，一旦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无疑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为有利。因此，1945 年 6 月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一次讲话中，曾高瞻远瞩地指出：

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

上也没有连成一片。①

抗战结束后形势的急遽变化，使东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进占并控制了东北的各大城市和铁路交通要道。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苏军在撤离东北地区后，将由国民党方面接管和行使在东北的行政全权。这一条对蒋介石、国民党是有利的，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就近接受日伪军投降、收复失地，则是很大的限制。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前，刘少奇经反复考虑，向毛泽东陈述了他对东北形势及党应采取的方针的看法和设想。刘少奇认为，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军队虽然受条约的约束，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这个意见，经考虑，决定派林彪带部队进入东北，去掌握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在重庆谈判期间，留守延安的刘少奇、朱德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电报频为往还，反复酝酿、周密安排，由刘少奇代中央起草文件，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即“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随后，中央决定从山东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版，第232—233页。

解放区抽调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迅速开往东北，并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加强对东北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

毛泽东在重庆及返回延安后，对向东北调动部队和干部的情况非常关注。他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起草了一系列指示，要求从冀热辽、晋察冀等解放区调集大批军事、政治、后勤、政权、民运、财经、党务、文化等各类干部奔赴东北，以解全力争取东北之急需。毛泽东明确指出，只要我党干部和部队到了东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就能够站稳脚跟，逐步把根据地建立起来。为了争取时间，方便赶路，甚至可以把武器放下来，只要人到了东北，就会有武器的。同时，他还详尽指示了各部队出关的具体路线、行动方针、工作任务、干部配置、粮款筹集以至枪械分配等大小各项事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争取和控制东北。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山东等解放区的各路部队或乘木船渡海，或轻装徒步行军，日夜兼程，长驱千里，陆续到达东北的战斗部队有11万人，干部2万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20人进入东北，其中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4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约占政治局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毛泽东全力争取东北以奠定中国革命胜利基础的极大战略决心。

到1945年12月底，蒋介石在美国直接援助下，经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进兵，先后攻克了原由人民军队控制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的严重斗争已经迫在眉睫。鉴于争夺东北的斗争对于全国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充分预计了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

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转入反攻。指示要求东北局全体干部，务必从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以战胜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在大力争取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团结，指示在长江以南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四军部队，一律撤至长江以北。“双十协定”签订后，分散在浙东、苏南、皖南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层层拦阻，相继撤离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区域，向苏皖边区和山东集中；同时，新四军军部率华东地区的主力部队北移山东和冀东，保障和发展那里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这样，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的战略部署下，各解放区部队向北大踏步地前进，争得控制热河、察哈尔、展开于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由南大踏步地后撤，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形成梯次递补、层层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态势。

经过三个月的局部性内战，蒋介石接连损兵折将，遭到沉重打击。这时，美国政府直接卷入中国内部冲突的政策，受到朝野的抨击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考虑到蒋介石一旦发动全面内战，“可能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的局面，因而在对华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即从五花八门的建议中，选择了“继续援蒋运兵，促成国共停战，改组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最佳方案。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称中国应“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